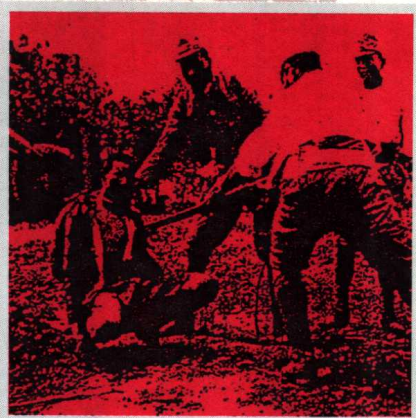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李恩涵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李恩涵 著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 李恩涵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1994[民 8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5-0852-3 (平裝)

1. 中日戰爭(1937-1945)

6285

82010113

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

定價新臺幣 380 元

著 作 者 李 恩 涵

責 任 編 輯 陳 淑 芬

封 面 設 計 王 文 騏

校 對 者 李 秀 娟 楊 俊 峯

發 行 人 張 連 生

出 版 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所

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3116118・3115538

傳真：(02)3710274

郵政劃撥：0000165-1 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 0836 號

登 記 證

• 1994 年 3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0852-3 (平裝)

65362

自序

日本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一～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約略長達十四年之久在中國與東南亞華人社區內所犯的非人道、違犯戰爭國際法的罪行與暴行，是罄竹難書的；舉其犖犖大者，如南京大屠殺、重慶無差別疲勞大轟炸、對華北游擊區的「三光（燒光、殺光、搶光）作戰」、七三一部隊之以活人解剖實驗、一千三百多次有紀錄的毒氣戰與細菌戰、鴉片、海洛英毒品的系統流毒、新加坡「檢證」大屠殺、馬來亞檳城、馬六甲、柔佛等地的「檢舉」大屠殺等等，都是證據確鑿，曾經過公正、客觀而可靠的史學研究者（包括許多位日本的公正、有良心而受過完整史學訓練的見證者與史學研究家在内）的驗證而一一紀錄在卷的。而且，這些罪行與暴行，除去七三一部隊事件之外，也是曾經戰勝日本的十一國的法官所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歷經長達兩年六個多月的長期而仔細的審判過程而定讞為「違背人道罪」與「一般性戰爭罪行」了的，另外，在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中國與蘇俄未受邀參加）中日本曾經明文承諾不為這些定讞改持異議或翻案的。所以，如果戰後新日本是一個負責任和有希望成為新世界之領袖國家的話，它的政府與社會當會如戰後西德（德國）對於戰時納粹政府所犯的罪行與暴行一樣，一定會採取不容置疑的懺悔與反省的態度的。但是，很不幸地新日本政府對此卻一直採取一種曖昧閃避、推脫延宕，甚至半公開地支持一些右派與對戰敗後果執迷不悟的人士出而作「全盤否認」或「部分否認」的謬舉。戰後日本社會隨著它經濟實力的復甦與壯大，不只開始出現了一些否定其過去侵略他國的戰爭責任的論調，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其他謳歌「侵略

有理」歪曲史實的種種說法，如「相互責任論」、「結果有益論」、「罪小功大論」、「戰爭時效論」、「排除感情論」等謬說，也都一一出現；而「部分否認」或「全盤否認」上述戰爭罪行與暴行的論著謬說，更是大行其道；其所給予戰後中生代與新生代的青年與壯年的日本人的壞影響，使他們對於他們的上一代當年在中國所犯過的戰爭罪行與暴行，不只一知半解，甚至印象模糊，完全不能從中取得什麼真正的教訓；其流弊所及，對日本與其周圍鄰國的可能影響，實不容忽視。雖然戰後的新日本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當前日本的政治界、學術界、思想界、輿論界也有許多學識淵博、頭腦清晰的人士，常常對於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所犯過的許多罪行、暴行與惡行，出而主持正義地予以痛斥，並發表很具前瞻性的遠見，以展望新日本的未來，但美化戰爭、肯定戰爭與對戰時罪行與暴行未予充分懺悔認罪的論評、小說、隨筆等文字，卻在日本輿論界居於主流。這是當前「經濟超強」、「技術大國」的新日本的一股逆流，充滿著不穩定的對日本本身的不祥之兆——日本的新軍國主義者是否會重新走上過去對外侵略的道路？一個不知反省、不知對戰爭暴行罪行悔罪而在經濟與政治上（當然也在軍事上）都非常強大的新日本，是否將重新走上在政治與軍事上向外擴張的道路？這確是一項值得關心東亞大局的中國與其他東北亞國家的朝野人士予以密切的關心與注視的大事。當然在核子時代的國際關係中，即使是新軍國主義者徹底控制了日本的政治與社會，基本上這是一個日本人自己對其國家命運應下判斷的問題。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擁有核子飛彈，誰怕地狹人眾的日本？新日本的當政者倒應該好好考慮一下，如果他們不對過去戰時的罪行與暴行好好做一總結性的「清理」，它過去多年所殘害過的鄰國如中國、蘇聯、韓國（朝鮮）等是否將對它施以像它過去施之

於人的「報復」？蘇聯輿論界即有人聲言，如日本對「北方四島問題」逼人太甚，蘇聯將饗日本以五十枚或一百枚核子飛彈！所以，本人作為一位關心戰時日軍罪行暴行的歷史研究者，我是非常希望能將這類史實忠實而完整地、客觀而公正地重建起來。我尤其認為，我們中華民族由於深受日本十四年之久（甚至自一八九四年算起已五十年之久）的種種破壞、掠奪、屠殺與毒化，其切膚之痛的深切與廣泛，在歷史上是難以磨滅的。中華民族一定要就其所發現的客觀、公正的史實向新日本追究責任，要求新日本根據當代國際法的原則，向中國道歉、賠償。新日本如果不對中華民族提出明確的正式性的道歉與適量的賠償，這些戰時舊帳是永遠無法了結的；中、日兩大民族永遠無法在未來真心誠意的和平相處。這也是一位歷史研究者對社會與人類正義的一份堅持忠誠的信念吧！

這便是我自一九八六年之後為什麼轉而全力研究日本戰時暴行的一些背景。我自一九五四年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之後，本來是研究十九世紀的中西關係的；其後因為去美國留學，修讀了一些不同階段的美國史、美國外交史與日本史的科目，才逐漸轉移興趣於二十世紀初葉的中西關係，如外資礦權、鐵路權與金融投資等等，至一九七五年之後，更頗致力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外關係，特別是當時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的「革命外交」問題。（當然我的研究興趣，同時也包括了對東南亞華人問題的了解與對湘軍巨頭左宗棠的研究，因為我一直想寫一本「左宗棠評傳」之類的書）。一九八六年之前，我雖然也為一九八二年日本「改訂教科書」事件而震駭而憤怒，但我總認為深入研究日本軍戰時罪行暴行的問題，實應該是研究更現代些的現代史研究同人的事，我不必越俎代庖。一九八六年三月，我因自所任教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休假八個月，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

versity of London) 擔任「訪問教授」(visiting readership)，因得初讀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洞富雄教授所著的《決定版：南京大屠殺》(東京：現代史出版會，一九八二年)一書，一方面我非常欽佩洞教授公正篤實追求真實的史學家風格，痛斥日本當時已大為流行的對南京大屠殺「否定」或「半否定」的一股逆流，勇敢地反擊這類人們的無理糾纏，而奮筆重寫了他出版多年的原著的義舉；一方面也引起我進一步研究南京大屠殺與其相關問題的高度興趣。其後，我自倫敦轉赴我的母校加州大學(Santa Barbara and Berkeley)繼續訪問，在柏克萊的 Doe Library 我開始閱讀戰後東京審判日本最高級 A 級戰犯的詳細紀錄(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Transcripts of Proceedings, April 29, 1946 - April 1948)，計共一百一十三巨冊(打字油印原件)，並包括了「證據」(exhibits)三千九百一十五件。另外，我也閱讀了許多皮藏於加大東亞圖書館(East Asiatic Library，除皮藏於 Durant Hall 的部分，也包括皮藏在 George Hall 與 Richmond 的中、日文書報雜誌等)的有關書籍雜誌。我也不時常去附近的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借閱日文書籍。這樣密集式的研究，使我對此問題很快便有了相當基本的了解。我返回新加坡之後，教學之餘，我總是繼續廣泛地進一步鑽研這一方面的資料；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與一九八九年我並利用赴美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在會後繼續前往 Berkeley 深入研究。至一九九〇年八月我離開新加坡國立大學教職之前，我已寫出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命〕令問題」與「日本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二文，內心對於有了這些小收穫，至感欣慰。時至今日，我則撰成了其他各篇論文而成為本書。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我仍滿有興緻而孜孜不倦地多方研究，一定要將其相關問題在

「多種文字」(multi-language)與「多種檔案」(multi-archive)的基礎上，一一在真實、公正、客觀、完整的檢驗下重建出事實的真象來，不達標的，絕不終止。

回憶過去漫長的七年歷程中，我現在憑几仰望窗外的雲彩，不禁想念起我當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十七多年長期友情鼓舞、砥礪論辯的一些老朋友，如歷史同行與同學的梁元生兄(Ph. D., UC Santa Barbara)、學哲學的呂武吉兄(Ph. D., Southern illinois)、學社會學的張震東兄(Ph. D., Chicago)等等，如今他們也都各自分飛，或去美國、或赴澳洲任教，而作花果之飄零了；而我也返回到我貢獻多年棉薄微力的中研院近史所了。在這方面，我要首先感謝老朋友本所前所長張玉法院士的鼎力賜助；其他老友如現任所長陳三井教授、王爾敏教授、陸寶千教授等的熱情惠助，也令我感銘五內；而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前系主任趙國材教授與老同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前院長李國祁教授的多方賜助，也是我永誌不忘的。此外，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連生先生對本書的印行，多予惠助，我要特別在本書出版之時，向他們再致我誠懇的謝忱。

瑯琊(諸城)

李 恩 涵 誌

於臺北市南港

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二月十九日

目 錄

自 序	i - v
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	1
南京大屠殺所涉及的戰爭國際法問題	55
南京大屠殺的屠殺命令問題	104
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與其所涉及的戰爭國際法問題	157
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對星洲華人「檢證」屠殺之役考實	171
抗戰期間日軍對晉東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戰」	209
南京大屠殺的事實豈容抹煞 一駁日本眾議員石原慎太郎之兩度狂言	254
附錄一：星馬華人的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年）	267
附錄二：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一～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侵華日軍罪行暴行日誌（初編）	332
附錄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名譽教授梁嘉彬博士 致作者函	389
附錄四：徵引及參考書目	391

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問題

日本軍在中日戰爭期間（一九三一～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對我國非戰鬥人員的平民與無戰爭能力的被俘人員的屠殺，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後持續八、九個星期之久的南京大屠殺，其「規模之大，受害人數之衆，持續時間之久，殺人手段之殘酷，均爲人類文明史上所罕見」^①；這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大污點，也是全世界的中華民族五十多年來刻骨銘心、斷難忘懷的事。特別當前日本政府內外的一批過去軍閥、財閥的中生代餘孽與受到他們影響的許多新生代日本人，不只在有意識地迴避這些歷史上暴行的事實，甚至還利用各種大眾傳播媒介與輿論製造者有系統地「淡化」或「否定」這些事實，這是東亞國際關係中一股極爲危險的暗流——他們只是想擴大宣傳日本戰時身受美國原子彈毀滅廣島、長崎的大悲劇，以爭取國際上人道主義者的同情，而進一步強化其所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或「日本無罪論」的論據而已^②。他們這些「反案派」心態的可悲，是將使日本邁上「第二次大毀滅」之途而不自知吧！但是這些「反案派」的惡劣行動，在歷史的事實之前是徒勞無功的，他們的意識與行動，只會引起當年身受日本暴行荼毒的國家與人民的極大憤怒，刺激起他們當年對日本刻骨銘心的仇恨，並促使這些國家的史學工作者加強對戰時日軍的血腥暴行從事客觀的、公正的、不同文字的與不同檔案的研究的決心而已^③。

一、南京大屠殺「屠殺數目」質疑的緣起

事實上，根據粗略的估計，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的四年期間，只中國戰俘被日軍屠殺者，即達一〇〇萬人之巨，而其中四〇萬一千人之被屠殺，則是極為確定的事實^④；另外，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國軍民被日軍屠殺的總數即達九〇〇萬人，或一〇〇〇萬人，其或高達一二〇〇萬人^⑤（其間日軍在戰時華北鄉村游擊區所進行的「三光」〔殺光、燒光、搶光〕政策所屠殺的正確人數，到目前為止，尚無客觀的研究，無從較正確地予以估計）^⑥，而南京大屠殺只是其中最大規模、最臭名昭彰的一大事件而已。專就南京大屠殺而言，戰後初期，日本政界輿論界與學術界在「一億人總懺悔」的掩護下，特別是經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在東京所進行的長達三年六個多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在審判日本 A 級戰犯時開始揭露日本戰時的許多重大軍事與政治的秘辛內情之後，他們還都普遍地承認之為事實，如今井正剛所撰「南京城内的大量殺人」（《特集文藝春秋》，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號）、島田勝己撰：「南京攻略戰と虐殺事件」（《特集人物往來》，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六月號）、秦賢助撰「血まみれの白虎部隊」（《日本週報》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及同期《日本週報》所刊載的「南京虐殺事件と松井石根日記」等^⑦。而秦郁彦在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初刊的《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一九六一年）於南京大屠殺也有相當詳細的敘述：除列舉中國方面的資料，認為被屠殺的中國軍民達四十三萬人，其中日軍第六師團所殺害者為二十三萬人，第十六師團所殺害者為十四萬人；也進一步說明被殺害者包括戰爭中的殺傷、戰

俘的屠殺與散兵（「敗殘兵」）、便衣隊（「便衣兵」）及平民的屠殺等等，而其中平民之被殺害者即有一萬二千人至四萬五千人^⑧。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洞富雄更於昭和四二年（一九六七年）撰刊《近代戰史の謎》（東京：人物往來社，昭和四二年，一九六七年），專研其事，列舉不同資料中所列明的南京大屠殺的屠殺數目，如：①日本《改造日報》（日文，上海發行）稱有四十三萬人；②南京「安全區」（Safety Zone）救濟委員會（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估計市民被殺四二、〇〇〇人，葬屍二十萬具以上；③南京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稱被屠殺者二七九、五八六人；另該處提供的另一項統計，則為集體屠殺者三十八萬人，一般市民六萬多人，合計四十三萬多人；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審判日本 A 級戰犯的判決書所認定的被殺害者在「二十萬人以上」等數字^⑨。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釣魚臺事件發生，中（包括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日關係緊張。一九七一年六月，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訪問中國大陸，調查戰時日軍戰爭犯罪問題，其所撰寫的專稿「中國の旅」在該報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一月十六日連載十天（其後並於一九七二年出版單行本《中國の旅》，朝日新聞社，二五八頁）；因讀者眾多，對日人的影響甚大^⑩。一時曾經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前日軍官兵也多良心發現，對大屠殺之事，就其親身的經歷，出而撰文作證，如岡本達三撰「杭州灣敵前上陸に参加して一兵隊日中戦争を語る」（雜誌《中國》，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河野光輝撰，「殺戮の現場を証言する従軍カメラマン」（《アサヒ藝能》，昭和四六年，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號）、田所耕三，「虐殺で對立する南京攻略戦の士兵たち」（《アサヒ藝能》，昭和四六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號）、篠原正瑛、守

山義雄，「西にナチズム、東に軍國主義」（《日中文化交流》，昭和四六年，一九七一年八月號）、鈴木二郎，「私はあの『南京の悲劇』を目撃した」（《丸》，昭和四六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小竺原清，「いまこそ明かす南京大虐殺の真象」（《週刊サンケイ》，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新島淳夫編，《南京大虐殺》（日中友好協會〔正統〕永福支部，昭和四六年，一九七一年三月）等等^⑩。一九七二年四月，洞富雄教授並將其舊著《近代戦史の謎》中的南京大屠殺的部分予以擴大，改寫成《南京事件》（東京：新人物往來社，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一書出版；他並另搜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英文資料，予以編纂，彙成《日中戦争史資料，八、九，南京事件Ⅰ、Ⅱ》（東京：河出書房，昭和四八年，一九七三年）兩大冊，予以刊佈行世^⑪。另外，本多勝一也另撰《中國の日本軍》（東京：創樹社，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一〇二頁）一書，論述戰時日軍在華的一些殘暴行為^⑫。

這一波描述南京大屠殺部分真象的文字與論著，很快即引起以《諸君》、《文藝春秋》等月刊為中心的擬對大屠殺持否定或部分否定態度的一批軍國主義餘孽者的反擊，而且他們最初不只想否定南京大屠殺，對於日本對華侵略的戰爭責任與戰爭犯罪問題，也很籠統地予以政治性的否定^⑬。「否定派」的代言人自稱為猶太人的イザヤ、バンダサン（譯者自稱山本七平）先刊佈「日本教について」（《諸君》，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一月號）與「《朝日新聞》のゴメンナサイ」（《諸君》，同上期）二文，拐彎抹角地提出否認日本對上次大戰有戰爭犯罪的問題；稍後，又發表「本多勝一様への返書」（《諸君》，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三月號），進一步提出南京大屠殺有無可能？日本應否對此謝罪的問題。

題？（後來才查明，所謂猶太人イザヤ、バンダサン實即大屠殺否定派主將之一、自稱前兩文的譯者的山本七平之化名）^⑮。一九七二年四月，原民間放送局記者鈴木明（一九二九年出生）則發表「『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南京大虐殺』之虛妄性」）（《諸君》，昭和四七年，一九七二年四月號）一文，以日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兩人於南京大屠殺期間之參與「百人殺人競賽」於戰後為南京國民政府定為「戰犯」處死為例，提出無紮實事實根據的一些辯詞，想為「百人斬」的鐵案事實翻案；並進一步基本懷疑南京大屠殺為虛妄的「虐殺神話」；鈴木明並攻訐田伯烈（H.J. Timperley）於大屠殺之後所撰寫的《外人目睹中的日軍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s*, London: Victor Collany, 1938）與洞富雄所著《南京事件》中無第一手（級）資料，基本懷疑大屠殺的真實性^⑯。山本七平、渡部昇一等也應聲倡和；前者刊印《私の中の日本軍》（東京：文藝春秋社，昭和五〇年，一九七五年）攻訐《東京日日新聞》記者鈴木二郎用忠實的態度所寫親身目睹南京大屠殺情形的「私はあの『南京の悲劇』を目撃した」一文，為「杜撰の小説」^⑰山本七平甚至進一步認為南京大屠殺為「無稽之談」^⑱。高崎隆治則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未來》一二三號，昭和五〇年，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一文中，對洞富雄教授所撰著的《南京事件》，逐條予以批判，意圖藉否定洞氏著作的學術性與權威性來否定南京大屠殺^⑲。而在此前後，鈴木明又繼續在《諸君》月刊的一九七二年八月號、十月號、十二月號與一九七三年一月號繼續討論南京事件與「百人斬」的所謂「虛妄化」、「渲染化」、「水増化」（膨脹化）等種種問題；這些詭辯式的純訴之於片面邏輯而以生花妙筆寫出的通俗性、非學術性的文字，後來更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彙印成

冊，以《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東京：文藝春秋社，昭和四八年，一九七三年）為書名出版，出版後即頗轟動一時，甚至在一九八二年得到了大宅壯一「非小說獎」（大宅壯一ノンフィクション獎），成為日本右派意圖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奠定基調的作品^②。而在約略同時，許多這類戰時「小戰犯」餘孽與右派文人更「一人吹噓，十人呼擁」，在影響塑造社會輿論與群眾心理的通俗性月刊、週刊等刊物中大量撰寫這類「全盤否定」或「部分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文字，其聲勢猖獗一時^③。

這些翻案性具有濃厚政治意識性的活動，自然很快即引起一些具有正義感的日本文化學術界對此素有研究的人士的反擊；戰後的日本到底是一個文化水準高而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絕大多數的文化人還是具有獨立判斷與自由思考的能力與習慣的。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本多勝一在所撰《中國の日本軍》一書，即列舉日本軍在中國的種種殘暴行為，而流行甚廣（這是通俗性的讀物）^④；洞富雄教授除將舊著《南京事件》重新改訂再版（新人物往來社，一九七二年），又將所編彙繙譯的《日中戰爭史資料，八、九，南京事件Ⅰ、Ⅱ》（東京：河出書房，昭和四八年，一九七三年）兩大冊刊行問世。另為有力駁斥大屠殺「虛妄化」的謬說，洞氏更奮筆撰寫連續多篇有根有據的學術性文章，如一九七三年七月在《歷史評論》上發表的「南京事件と史料批評」一文等；一九七五年八月更將這些文章彙集成冊，出版專著《『まぼろし化』工作批判：南京大虐殺》（日本現代史研究會）（《『虚妄化』南京大虐殺之批判》），其中彙有他所寫的「『南京大虐殺』まぼろし化工作批判」一文，嚴詞批評鈴木明、山本七平等無視歷史事實的種種謬說^⑤。本多勝一也另編寫了《ベンの陰謀：淺海一男、鈴木二郎、高崎隆治論文をふくむ》（東京：潮出版社，昭和五〇年，一九七五

年），批評鈴木明等人的否定論論點；該書中也收集了洞富雄教授的多篇文章，以加強其肯定南京大屠殺的論據²⁹。

一九八二年秋，教科書檢定（審查）事件發生，中共與韓國均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中華民國、北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也為之譁然反對，民間反日的情緒，尤其高漲。日本舊軍人與政治上的保守派和對戰前侵略罪行不改悔的右派文化人等以《偕行》（舊日本士官學校與陸軍大學畢業生組織所發行的月刊）、《月曜評論》、《世界日報》、《じゅん刊：日本と世界》、《サンケイ新聞》、《諸君》、《正論》等雜誌與報紙為中心，則想乘機大肆製造社會輿論，以不同的作者大量連續發表通俗性的文字，互相吹捧，不僅想肯定過去「侵略中國有理」的謬說，甚至進一步想「全盤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指之為「虛構」、「渲染」與「水增」（誇大）；其中尤以原任 A 級戰犯松井石根（即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最高將領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官階大將，戰後為同盟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隨從秘書、自稱是拓殖大學講師的田中正明，最為猖狂，先撰有《南京大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將の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日本教文社，昭和五九年，一九八四年），又編有《松井石根大將の陣中日誌》（東京：芙蓉書房，昭和六〇年，一九八五年），另又寫有「南京虐殺事件と松井石根日記」（《日本週報》，昭和三二年，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大虐殺』ので『ちあげ』（《靖國》，一九八三年七月號）、「『南京大虐殺』、松井石根の陣中日誌」（《諸君》一九八三年九月號）、《六つに分かれた判決東京裁判とは何か》（一九八三年日本工業新聞社）、「『南京虐殺』と松井石根の陣中日誌」（《諸君》，昭和五八年，一九八三年九月號）、「『東京裁判史説』に屈服した改訂教科書の危険性」（《全貌》一九八四年二月號）、

「東京裁判と南京大虐殺の虚構」(《外交時報》一九八四年二月號)、「朝日ジャーナルに載つた『南京大虐殺』のニヒ寫真」(《全貌》一九八四年十月號)等大量書籍與文字；一九八四年十月，田中正明甚至在日本雜誌界發行量最大的《文藝春秋》中，發表論述南京大屠殺的文字，完全無視於經過多種文字、多種檔案資料所證明了的事實，掇拾一、二無根據的推測之詞，即信口雌黃地全面否定日軍大屠殺的罪行，指之為「虚構」；他甚至還進一步為發動侵華戰爭而推卸責任，誣蔑性地謾過於中國²⁵。其他應聲唱和的「反案派」，還有渡部昇一寫有《歴史の讀み方》(祥傳社，昭和五十四年，一九七九年)，谷口巖寫有《南京大虐殺の研究》(Office PANO，昭和五九年，一九八四年)等²⁶。

同時期內，舊軍人《偕行》月刊編輯畝本正己甚至協同田中正明等六人，為教科書中所記述之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殺與「北方領土」(牽涉蘇聯)等問題，對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賠償各一〇〇萬元²⁷。稍後，畝本正己所組織之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舊軍人的所謂一連串「證言」，即在《偕行》一九八四年(昭和五九年)，四月號開始連載，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二月號，共連載十一次。此後，該雜誌更繼續在一九八五年三月號、五月號、七月號、一九八六年(昭和六一年)一月號等繼續刊載類似的回憶「證言」，狂妄地與技巧地企圖將南京大屠殺縮小為「南京事件」，認為其「不法行為」的殺害只有三千到六千人左右²⁸。另由漏網小戰犯登川幸太郎所寫的「總括的考察」之部，竟也只認大屠殺的殺害數目只有三千人到一萬三千人²⁹。除此之外，根據田中正明的謬說而進一步推論的板倉由明則寫出：「『三十萬虐殺說』虚構の證明——南京大虐殺の數字的研究」(《全貌》昭和五九年，一九八四年三月號；一九八四年十月號、昭和六〇年，一九八五年四月號)